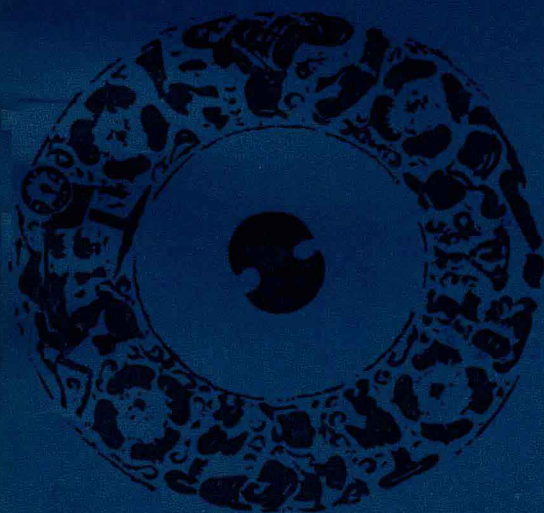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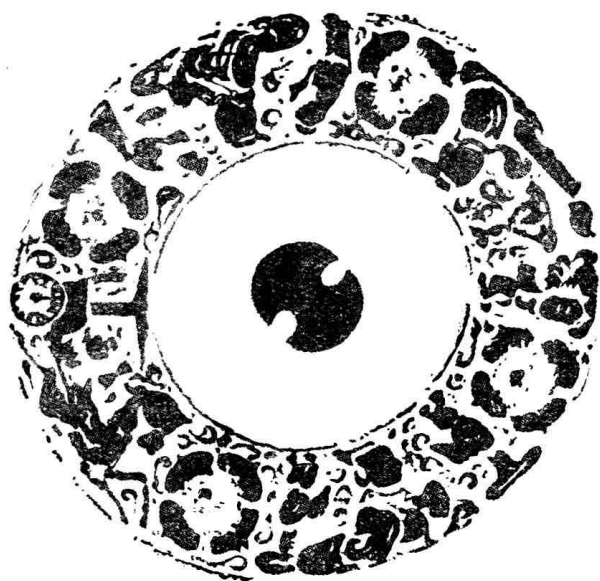


德

周一谋编著

历代名醫論醫德





历代名医论医德

周一谋编著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历代名医论医德

周一谋 编著

责任编辑：朱 杰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9.75 字数：220,000

印数：1——7,200

统一书号：14204·83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绪论·····	(1)
先秦经典著作节录·····	(26)
《内经》七则·····	(33)
《难经》三则·····	(38)
三书论扁鹊·····	司马迁等(40)
仓公传节录·····	司马迁(49)
苏耽传·····	《列仙传》(61)
郭玉传·····	范 晔(63)
伤寒论自序·····	张仲景(65)
华佗传·····	范 晔(71)
董奉传节录·····	《神仙传》(78)
皇甫谧传节录·····	《晋书》(80)
肘后备急方序·····	葛 洪(87)
论医·····	杨 泉(89)
备急千金要方序·····	孙思邈(91)
大医习业·····	孙思邈(96)
大医精诚·····	孙思邈(98)
梁新与赵鄂·····	孙光宪(103)
钱乙传·····	刘 跂(105)
庞安时传·····	《宋史》(113)
书证类本草后·····	宇文虚中(116)
妇人大全良方自序·····	陈自明(118)
外科精要自序·····	陈自明(121)
医不贪色·····	张 杲(125)

治痰嗽·····	张 杲(126)
医工论·····	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(128)
洗冤集录序·····	宋 慈(130)
检验总论节录·····	宋 慈(133)
腰胯痛·····	张从正(138)
李杲传·····	李 濂(141)
曾世荣·····	《衡州府志》(147)
活幼心书序·····	罗宗之(148)
世医得效方自序·····	危亦林(150)
丹溪翁传节录·····	戴 良(153)
丹溪先生墓志铭节录·····	宋 濂(160)
活人为心, 不记宿怨·····	万 全(167)
周察小儿病两例·····	万 全(171)
严乐善·····	《嘉兴府志》(172)
解围元薮自序·····	沈之问(174)
李时珍传·····	顾景星(177)
本草纲目序·····	王世贞(186)
本草纲目六则·····	李时珍(191)
针灸大成医案二则·····	杨继洲(201)
儒医·····	徐春甫(203)
庸医速报·····	徐春甫(205)
医箴二则·····	龚 信(208)
医家与病家之要·····	龚廷贤(209)
医家病家通病·····	龚廷贤(212)
证治准绳自序·····	王肯堂(214)
习医规格节录·····	李 梴(219)
医家五戒十要·····	陈实功(223)
祝医四则·····	缪希雍(228)
论治篇·····	张介宾(231)
不失人情论·····	李中梓(234)

李台春·····	《宝庆府志》(238)
温疫论原序·····	吴有性(240)
巫卜之鉴·····	吴有性(243)
明问病之法·····	喻 昌(246)
叶桂传·····	《清史稿》(249)
临证指南医案华序·····	华岫云(252)
临证指南医案嵇序·····	嵇 璜(257)
外科证治全生集自序·····	王维德(259)
沈氏尊生书自序·····	沈金鳌(262)
人参论·····	徐大椿(265)
名医不可为论·····	徐大椿(268)
医学心悟自序·····	程国彭(270)
串雅序·····	赵学敏(273)
温病条辨自序·····	吴 瑭(278)
冷庐医话一则·····	陆以湜(282)
医林改错脏腑记叙节录·····	王清任(283)
验方新编序·····	鲍相璈(287)
张朝魁传·····	《清史稿》(289)
明医、草医与大医·····	周学霆(290)
书方宜人共识说·····	顾铭照(296)
医门补要自序·····	赵 濂(297)
后 记·····	(301)

绪 论

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，素称礼义之邦。自商周以来，在许多古代文化典籍中，就充满了道德礼义的宣传。有关惩恶劝善、激浊扬清、褒贬是非的内容，在先秦的文献中比比皆是。《周易》一开始就提出“进德修业”，“自强不息”，认为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。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就曾写道：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礼；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（《邶风·相鼠》）这是人民群众以民歌的形式，对粗鄙野蛮、放纵无礼之徒的严厉谴责。《论语》强调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用礼来约束。《礼记·礼运》更提出了非常讲究文明礼貌的大同世界的理想。这是对原始公社的一种理想化的描写，也可以说是古人的一种政治理想。其中写道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这里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、任人唯贤的，人们互相信赖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帮助。不仅尊敬自己的父母，也同样尊敬人家的父母；不仅爱护自己的子女，也同样爱护人家的子女。使老年人能乐享天年，青壮年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少年儿童能够健壮地成长，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，能够得到社会的供养，疾病和残废人员，能够得到社会的照顾和治疗。男女有别，各司其职。只怕货物被糟蹋和浪费，不必私藏于己；只怕自身为社会效力不够，不必考虑个人的私利。因此，搞阴谋诡计，违法乱纪，偷扒抢骗之类的事，几乎完全绝迹，社会秩序十分安定，人们夜晚可以不关大门睡觉。

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，在封建社会里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却也曾鼓舞着历代许多仁人志士，为着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斗。

中国医药学，是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我国医学从一开始，就接受了上述古代精神文明的影响。比如惩恶劝善，褒功贬过，同情人民疾苦，以扶危济困为己任，哀孤恤寡，尊老爱幼，待人以诚，彬彬有礼等，这些传统的文明道德，常常在古代医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得到反映。例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写的《大医精诚》，就是一篇集古代文明道德之大成的优秀医德论文。他就医生的思想品德，专业学习，对待病人的态度，如何处理同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等，进行了全面、深刻、精辟的论述。我国的传统医德，比西欧各国尤为突出，其内容更丰富、更深刻、更全面。被誉为西方“医学之父”的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（约公元前460—前377年），曾经写过一篇《誓言》，可说是一篇医德专论，后来收录在《希波克拉底全集》里。《誓言》中写道：“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，作为终身同业伴侣，彼有急需我接济之。视彼儿女，犹我兄弟，如欲受业，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。”“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所及，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，并结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，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，并不作该项之指导，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。”“无论至于何处，遇男或女，贵人及奴婢，我之唯一目的，为病家谋幸福，并检点吾身，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，尤不作诱奸之事。凡我所见所闻，无论有无业务关系，我认为应守秘密者，我愿保守秘密。”（见李涛《医学史纲》289页，1940年北京：中华医学会编辑部出版）这个《誓言》，各国的医学界都奉为信条，被作为西方医学的道德标准沿用了两千多年，至今还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。然而在我国，类似希波克拉底氏的论述实在多得无法称引，而且内容广泛深刻得多。一部中国医学发展史昭示我们，在中国古代，几乎没有一位名医、没有一个医学家不重视医德修养的，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们应当加以珍惜，努力予以继承和发扬。

古代医德可以继承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即使是一般的传统道

德，尽管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，但其中也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。至于医德，情况更不相同了，它是一种职业道德，其根本出发点是忠于医生的职守，竭诚尽智地为救治病人效力。虽然也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，但比较起来，它的人民性更为突出。对于传统医德，不仅应当加以继承，而且必须努力予以发扬。大家知道，社会主义医疗道德的基本原则就是：忠诚于人民的健康事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；也可以说是对人民群众极端热忱，极端负责，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。这些原则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我们今天的优秀医德，正是在继承前人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我国古代对医德有很严格的要求，早在西周时期，对医生就有全面考核的制度。据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：我国医学在西周时即已出现分科，分为食医（营养医生）、疾医（内科医生）、疡医（外科医生）及兽医四科。不论哪一科，每到年终都要进稽考。“岁终则稽其医事，以制其食，十全为上，十失一次之，十失二次之，十失三次之，十失四为下。”毫无疑问，这里的年终考核，不单纯是技术考核，还包括着医生的思想、品德、作风、态度等方面的内容。一个思想品德很差的医生，就不可能获得“十全为上”的成绩。《素问·征四失论》说得很清楚：“所以不十全者，精神不专，志意不理，外内相失，故时疑殆。”这就是说，医疗差错的产生，除了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有关之外，还决定于“精神不专，志意不理”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，其实质也就是医德问题。因此，古代医家在论述医疗技术时，几乎都要论及医德修养。本书选辑了历代名医论述医德的文章七十余篇，选材范围包括历代文献中的医德论专、医家传记、医书序文、医案、医话及某些地方志中有关医家医德的记载。为了保存各篇的完整性，一般力求选编全文，篇幅过长的则只作节录。对于不宜选编的文献，则只作语录摘抄。一律按历史顺序加以编排，以窥其承前启后的相互关系。因文字古奥，义理艰深，不易阅读理解，故每篇均作了提要和注释，极少数篇章还加了按语。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古代名医的优秀医德。

其主要内容，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热爱事业 勤学苦练

《论语·雍也》说得好，“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”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：勉强学习的人，不如爱好学习的人；而爱好学习的人，又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。当医生的尤其是这样，只有无比热爱自己的专业，并以从事医学专业为乐时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，也才有可能真正做出成绩来。晋代杨泉（一作梁代阳泉）在《物理论》中说：“夫医者，非仁爱之士，不可托也；非聪明理达，不可任也；非廉洁淳良，不可信也。是以古之用医，必选名姓之后，其德能仁恕博爱，其智能宣畅曲解……贯幽达微，不失细小，如此乃谓良医。”这就是说，医学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好的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医生的。因此，古人对医科学生的挑选十分严格，必须品德高尚，热爱医学专业，加上聪明好学，才有可能获选。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明确提出：“非其人勿教，非其真勿授”，不是适合于学医的对象，绝对不教；不是准确无误的医学知识，也绝不传授。长桑君收扁鹊为徒，乃是经过“出入十余年”的观察了解，知道“扁鹊非常人”，才把全部秘方书传授给他。公乘阳庆为西汉医学高手，他因家资殷富，从不轻易给人看病，更不受授学徒，就连子孙也不教。当他看到淳于意十分酷爱医学，而对待老师又很恭谨时，便破例地收了这个学生。并且很高兴地说：“我家给富，心爱公，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。”元代名医朱震亨三十岁时始攻《素问》，四十多岁时游学各地，遍访名师。当他得知在武林（杭州）修道的罗知悌擅长医学时，便毫不犹疑地前往拜师。罗知悌是金代名医刘完素的再传弟子，旁通张从正、李杲的学说，颇负盛名，但为人很傲慢。朱震亨前后往返十次，罗氏竟不接见。朱震亨求师心切，并不因此而灰心，恰恰相反，他“志益坚，日拱立于其门，大风雨不易”。（宋濂：《丹溪先生墓志铭》）此种精神，使罗知悌

深受感动，于是整理衣冠出来接见。交谈甚欢，有如故旧，只恨相见之晚。罗知悌尤喜朱氏之精诚好学，便倾囊倒箱，和盘托出，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。

东汉医学家张仲景，年青时曾跟从张伯祖学医，由于刻苦钻研，勤学苦练，后来医术“精于伯祖”，竟是青出于蓝。他对医学的高度热爱和重视，已在《伤寒论自序》中款款输诚。他批评当时的士大夫“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”，只知道“竞还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唯名利是务”，指斥他们是蒙蒙昧昧的“游魂”。张氏处在战祸绵延，疫病猖獗流行的东汉末年，到处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惨象。张氏家族原为南阳郡的世家大族，一向有两百多口人（也有认为是两百多户的）。可是从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，竟有三分之二的人罹病死去，其中死于外感发热之伤寒病症的占了十分之七。严酷的现实迫使他更加重视医学的研究，于是悉心钻研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（即《灵枢》）、《八十一难》（即《难经》）等古典医学名著，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，终于写出了《伤寒杂病论》这部不朽的名著。现存的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两书，实质上就是由此书一分为二的。张氏不仅有功当世，而且泽及后世子孙，后人因而立祠纪念他。不仅在他的家乡南阳一带建有医圣祠，外地亦有纪念性建筑。据《长沙县志》记载，长沙原有一所张公祠，“建在湘城中贤良祠之西，祀汉太守张机，字仲景。汉时长沙大疫流行，治法杂出，公为作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方》行世，全活无数。祭法曰：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，此之谓也。”由于张氏的研究成果能为子孙后代造福，所以人们纪念他。

唐代名医孙思邈，由于“幼遭风冷，屡造医门，汤药之资，罄尽家产”，因而深感医学之重要。毕生嗜医成癖，竭力攻读医学，直到“白首之年，未尝释卷。”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，世医家庭出身，精心于医药学的研究。他看到历代本草谬误颇多，感到忧心如焚，认为事关人命，不可等闲视之。因而搜罗百氏，采访四方，“岁历三十稔，书考八百余家”，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，编撰

了《本草纲目》这部驰名中外的医药学巨著。由此可知，不论古今中外，凡是卓有成就的医药学家，没有一个是热爱本专业的，也没有一个不乐意为医药事业献身的。如果朝秦暮楚，见异思迁，没有牢固的专业思想，是任何成绩也做不出来的。

“至道在微，变化难极”，（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）“自非才高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”！（张仲景：《伤寒论自序》）医学的道理很艰深，疾病的发展千变万化，若非多闻博识，勤学苦练，又怎么能掌握它呢？很难设想，一个坐井观天，孤陋寡闻的人能够精通医学。究竟医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历代医家，多有论述。《素问·著至教论》提出：一个好的医生“必须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。”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又说：“治不法天之纪，不用地之理，则灾害至矣。”东汉医家华佗之所以在医学上造诣很高，与他“游学徐土，兼通数经”是分不开的。张仲景强调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认为自己绝非生而知之者，必须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来掌握方术。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，家贫好学，常常“带经而农”，一边生产，一边读书，文、史、哲、医各方面的书籍都读。直到中年得了风痹症，处于偏瘫状态，仍然“耽玩典籍，忘寝与食，时人谓之书淫”。（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）州郡的藏书，他几乎读遍了，竟至直接写信向晋武帝借书，晋武帝便赠送了他一车书。其嗜书成癖，亦可见一斑了。晋代医家葛洪家贫，常“饥寒困瘁，躬执耕耨”，自恨“农隙之暇无所读”，便千方百计借书。“乃负笈徒步行借，又卒于一家，少得全部之书。益破功日伐薪卖之，以给纸笔”。（《抱朴子外篇·自叙》）他背着书箱，到处借书，很难在某一人家借到所需之书。于是起早贪黑，上山砍柴变卖，换来纸笔抄书。劳动时，还经常用树枝在田头地边练字，“常乏纸，每所写，反复有字，人鲜能读也”。由于缺乏纸张，常常在每张纸的正面和反面都写上字，致使别人很少能看清。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仍然博涉群籍，“但贪广览，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，曾所披涉，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，下至短杂文章，近万卷”。后来他在医药学和其他学术上，都有很高的造诣，与他

勤学苦读是分不开的。

孙思邈主张医生博览群书，认为医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文学、天文、地理等，都要阅读，才能于医道无所滞碍。否则如“无目夜游，动致颠殒”。（《千金要方·大医习业》）李时珍更是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刻苦钻研的典型。他曾向王世贞作自我介绍说：“长耽典籍，若啖蔗饴，遂渔猎群书，搜罗百氏。凡子史经传，声韵农圃，医卜星相，乐府诸家，稍有得处，辄著数言。”（《本草纲目·序》）他以学习作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，读书就象吃甘蔗饴糖一般。他广为涉猎，除了医书之外，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语言学、音韵学、农学、天文、历法，乃至诗歌小说，无不披阅浏览，只要遇上有关医药学的内容，就立即加以摘录笔记。这就为他后来编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。

明代医家徐春甫说：“医学贵精，不精则害人匪细。”（《古今医统·庸医连报》）南齐褚澄说：“病有微而杀人，势有重而易治，精微区别，天下之良工哉！”（《褚氏遗书·审微》）他们的话是很对的，一个医生必须技术专精，否则就会贻误人命。技术低劣的医生，可以把轻病患者治死；而技艺高超的医生却能化险为夷，使垂危病人得救。《难经·十三难》指出：“阳绝补阴，阴绝补阳，是谓实实虚虚，损不足，益有余，如此死者，医杀之耳。”因此，当医生的绝不能浅尝辄止，“不得道听涂说，而言医道已了”，甚至略略记下几个处方，就以为“天下无病可治”，那样只能误己害人。医学知识的精与博是辩证的统一，没有博就不可能精，而只博不精也不能解决问题。要学好专科，首先必须学好基础知识，要攻外科，必须先学内科。明代医家李梴说得好：“如欲专小科，则亦不可不读大科；欲专外科，亦不可不读内科。盖因此识彼有之，未有通于彼而塞于此者。”（《医学入门·习医规格》）知识就好象连通器，是彼此渗透，相互补充的。古代许多医学名家，常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、针灸各科兼通，如扁鹊、华佗、孙思邈等，无一不是如此。

要使医术专精，必须安贫乐道，不慕荣利。古代许多名家拒

绝荐拔做官，毕生行医于民间，其道理也就在这里。如果“孜孜汲汲，唯名利是务”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精通医学的。据《历代名医蒙求》和《古今医统》等书记载：北宋时期，有个进士叫沈常，因性格孤僻高傲，曾求仕多年，未能弄到一官半职。但他并不死心，便赴京师（开封）寻求仕进的门道。一天，他在东华门遇见一位“跃马扬鞭，从者雄盛”的翰林医官，便叹息不已地说：“吾穷孔圣之道，焉得不及甘草、大黄辈也？”因而产生了弃儒习医的念头。第二天，他从一个药店经过，听人说起业医的艰难困苦，“复又耻为，疑贰不决”。他自视清高，认为学医是大材小用，低身俯就。他跟别人议论说：“吾辈学则穷达方书，师必趋事名公，自非常流比也。”认为以他的满腹经纶去学医，有如探囊取物，只须参拜一位名师，稍得指点，即可蜚声医坛。当时有位太医，名叫赵从古，在医界颇有声望，沈常便决计去拜访他。乍一见面，沈常说：“此来穷蹇之人，因同人相勉，令某学医，闻君名公也，故来师问。”赵从古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足下既言穷蹇，是志未遂，复却学医，深恐郁滞之性，未能精研。”沈常见赵存古批评他功名利禄之心仍切，不可能专心致志攻读医学，颇不以为然，便愠怒不已地说：“吾虽穷蹇，乃自服儒，读孔孟之书，粗识历代君臣治国之道，今徒志学技术，岂为高艺？”赵从古驳斥说：“恐非浅尝能也，君未谕上古三皇医教……吾闻儒知礼义，医知损益。礼义之不修，昧孔孟之教，损益之不分，害生民之命。儒与医岂可轻哉！儒与医岂可分哉！”古代强调先通儒理，后通医理，也就是说，先要打好文化基础，然后才能攻读医书，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。沈常中了进士，无疑已通儒理，学医很有文化基础；如果他真的重视和热爱医学，并且下定决心钻研，是完全能够学好的。无奈他求仕之心仍切，时时在宦途与医学之间较短量长，比高论低，总希望有当一日，否去泰来，官运亨通。因而徘徊不定，首鼠两端，这怎么能学好医学呢？最后也只能为虚度年华而嗟叹不已了。故历代医家择徒授艺，都要挑选心诚意专的人。即使是名医的子孙，也不一定都能克绍箕裘，继承家学。明代著名儿科医学家万全，共有十个儿

子，后来没有一个能继承父业的。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死之前，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说：“医可为而不可为，必天资敏悟，读书万卷，而后可以济世。不然，鲜有不杀人者，是以药饵为刀刃也。吾死，子孙慎勿轻言医。”（《清史稿·叶桂传》）这段话，概括了叶氏行医数十年的阅历和体会，是很值得医务工作者们深思的。

二、不分亲疏贵贱，全力救治

历代名家都认为医学是仁术，强调对任何病人都要关心、体贴、爱护，做到竭诚尽智，全力救治。孙思邈主张不分贫富贵贱，一视同仁。他说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、长幼妍媸、怨亲善友、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。”（《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》）凡属患者求治，当医生的应当屏弃一切私心杂念，不问病人贵贱贫富，年龄老少，容貌美丑，聪明愚蠢，也不管他属何民族，都要精诚诊治，把所有病人都当做自己的至亲好友看待。北宋医学家唐慎微，医技十分高明，“治病百不失一”，凡病家来请，“不以贵贱，有所召必往。”元代朱震亨主动去贫病之家诊治，尤其照顾“困厄无告”的病人。相反，对于那些颐指气使，盛气凌人的豪贵，不仅不予逢迎，而且敢于藐视。有一次，“权贵人以微疾来召，危坐中庭，列三品仪卫于左右。先生脉已，不言而出。或追问之，先生曰：三月后当为鬼，犹有骄气耶？”（宋濂：《丹溪先生墓志铭》）对于列三品仪卫以逞威风的权贵，朱氏不屑与之言，而对贫苦患者却热忱相待，表现了古代良医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。

明代医家龚廷贤主张“博施济众”，强调“贫富虽殊，药施无二。”他对当时社会那种重富轻贫的风气很不满。曾在所著《万病回春》中写道：“今世之医……每于富者用心，贫者忽略，此固医者之恒情，殆非仁术也。以余论之，医乃生死所寄，责任匪轻，岂可因贫富而我为厚薄哉！”龚氏认为，治病以贫富分厚薄，是很

不人道的，违背了医生的职守，因而予以批评。明代外科医家陈实功，对贫苦患者尤为关怀。他在所著《外科正宗》中说：“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，请观者便可往之，勿得迟延厌弃。”又说：“贫富之家，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，凡来看病，不可要他药钱，只当奉药。再遇贫难者，当量力微赠，方为仁术。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，命亦难保也。”陈氏悉心专攻外科四十余年，毕生治愈的人无数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贫苦患者。对于个别极端贫困的病人，他不仅免费供给医药，还酌情赠送生活费。这种博施济众的精神，一直为后人所传颂。

治病贵速，一发千钧，凡病家有请，就得不顾艰险疲劳，立即出诊。孙思邈对于求治的患者，总是有求必应，做到了“勿避嶮巇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。”北宋唐慎微，应诊也是“寒暑雨雪不避”。元代朱震亨更是不惮路途远近，有请必往。“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，先生无不即往，虽雨雪载途，亦不为止。仆夫告痛，先生谕之曰：病者度刻如岁，而欲自逸耶？寡人求药无不与，不求其偿。其困厄无告者，不待其招，注药往起之，虽百里之远弗惮也。”（宋濂：《丹溪先生墓志铭》）四方有请，朱震亨随时启程，风雨无阻。其仆人为了照顾他的健康，曾代为向病家诉说辛苦疲惫，要求免于出诊。朱氏得知以后，便启发开导仆人说：病人度日如年，痛苦不堪，当医生的怎能自图安逸呢？说罢拎起药箱就出诊，甚至往返百里以上也在所不辞。

治病不分生熟亲疏，即使是有宿怨旧恨的人家，也绝不拒绝诊治。在这一方面，明代儿科医学家万全做得很突出。他不念旧恶，不计前仇，曾经千方百计地救治好一怨家小儿的危重病症。据万全在所著《幼科发挥》中记载：怨家胡元溪，有个四岁的儿子患咳嗽吐血，遍延名医，百治不愈。无可奈何，只好来求万全。万氏“以活人为心，不记宿怨”，立即前往病家诊察。经过确诊以后，便诚恳地对胡元溪说，此病“可治，吾能愈之，假一月成功”。万氏当即处方治疗，服药五剂以后，“咳减十分之七，口鼻之血止矣。”不料胡元溪嫌其子之病愈“太迟”，而且“终有疑心”，“终不释